

## 移住記憶、社群媒體與跨國身分協商： 以在臺越南女性移民為研究對象\*

王右君\*\*

---

投稿日期：2025 年 2 月 19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5 年 5 月 19 日。

\* 作者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修改建議，並衷心感謝所有研究參與者分享寶貴的生命經驗，計畫助理們在計畫執行過程中的協助，同時在此致謝。本文部分內容曾宣讀於「2023 年臺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2023 年 11 月 18 日，國立政治大學），感謝當時評論人和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本文研究承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越南裔新住民女性在臉書上的敘事記憶與身分協商：以雙語使用者為對象」，110-2410-H-006-067），部分內容取自該計畫案執行成果。

\*\* 王右君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e-mail: yowjiun@ncku.edu.tw。

本文引述格式：

王右君（2025）。〈移住記憶、社群媒體與跨國身分協商：以在臺越南女性移民為研究對象〉，《新聞學研究》，165，31-77。https://doi.org/10.30386/MCR.202510.0017

## 《摘要》

本文以在臺越南女性移民的雙語臉書敘事為研究對象，探討移民女性如何經由社群媒體建構移住記憶與協商跨國身分。研究指出，臉書上的跨境敘事平臺有助移民女性同時與母國和接待國親友分享日常生活記憶，建立社會連帶與跨國在場性。然而，雙重對話脈絡的存在，意味雙重感知他者的預設和期待，左右了敘事者建構記憶所依循的敘事腳本。無論是與母國或接待國的閱聽人對話，研究參與者傾向再現移居生活的美好事蹟，突顯在臺生活的幸福時光以及不忘母國文化的移民情懷，負面的生命記憶則在理想化的腳本中選擇性地遺漏、修飾或轉化。至於誇示移民生活或批評接待國社會的話語，可能在觀感考量和人際關係的前提下隱而未顯或低調呈現。保持正面但不張揚的敘事傾向不僅出於告慰家人和尋求他者認同之心，亦來自移民女性力求克服劣勢、找尋快樂與自我價值的意念。移住記憶的理想腳本體現，肯認了敘事者的跨國存在，亦維繫了幸福和尊嚴的感受。臉書上的雙語敘事記憶反映與建構敘事者所實踐或嚮往的生活腳本，也銘記了在臺越南女性協商移民身分時的處境與歷程。

關鍵詞：在場、社群媒體、身分認同、移住者、敘事記憶、腳本

## 壹、前言

越南語和中文都有一個「回」和「去」的字。……我每次都跟我媽媽說，媽媽我要回臺灣，然後跟我婆婆說，媽媽我要回越南。對我來講，……這兩個地方都是我的家，所以我都用「回」這個字（芝語，訪談紀錄，2020年6月9日）。

芝語（化名）原生於越南，在臺接受高等教育並成家立業。她在學校教授越南語，受到學生的尊敬和喜愛。中文是她熱衷學習的語言，也是與臺灣生活圈建立連帶的路徑；越南語是她和雙親相繫的語言，母國文化尊嚴所在。在她的臉書帳號上，可以見到她以中文和越文發布圖文，與兩地親友和社交網絡分享日常生活。

芝語的跨國人生是移民女性常見的生命寫照：臺灣的新建家庭與母國的原生家庭，都是生命中的一環。社群媒體的雙語使用，表徵了兩地之間精神上的移動以及身兼移民海外者（emigrant）和外來移民（immigrant）的雙重身分，一張照片、一則短文，刻印了雙軌人生走過的痕跡。做為一種敘事記憶的路徑，社群媒體上的微型生活記錄乃在對話之中完成，可能因對話脈絡以及對於對話者的期待而異（王右君，2019）；跨國移民的雙語敘事，體現於雙重對話脈絡，一方是位於母國原鄉的家人、親友和同在海外的同鄉，另一方是位於接待國的家人、朋友和生活交往圈。社群媒體跨越國界距離之際，也打開了跨國移住者同步與母國／接待國對話的空間。

誠然，數位媒體多元和個人化的發展，有助當代移住者經營跨境活動、與母國建立實質聯結，改變失根處境（Diminescu, 2020）；身為接待國社會中的少數，移住者也可在社群平臺上找到主動現身和發聲的空

間 (Nikunen, 2020)。社群媒體的能供性為移住者帶來跨國在場的想像，然而，欲同時在母國和接待國的生活圈建立存在感，必須妥善維持兩地社會關係以經營跨國身分。自我身分的建構植基於生命記憶，生命記憶的再現仰賴生活故事的述說 (McAdams, 2003)，在單一社交平臺帳號中朝向兩種對話對象的生命敘事，固然隱含了雙重身分建構的工程，但不論對話對象為何，在個人帳號中由眾多發文構成的敘事連續體，終究歸諸單一個體的生命記憶。值得探問的是，意欲建立跨國在場性的移住者，該如何在兩地不同聆聽脈絡中述說個人生命經驗？雙重聆聽脈絡下的不同期待，又如何指引移住者經由社群媒體中介的自我敘事建構生命記憶和跨國身分？而敘事者最終又如何在雙軌協商中整合自我身分？

對於在臺越南女性移民而言，跨國身分的建構工程，因母國族裔增添複雜性。自 1990 年代以來，來自越南的移民女性日增，逐漸成為臺灣人口中的顯著存在，人數在東南亞裔移民中居首位。<sup>1</sup> 與其它東南亞裔女性移民相同的是，越南女性在臺灣常背負仲介婚姻所帶來的集體污名，即令肯認其身分的「新住民」一詞存在已久，仍可能在媒體再現中被底層化 (夏曉鶯, 2000, 2001, 2002；陳欣欣, 2020；龔宜君, 2019)，而對於越南人的刻板印象經常擴及整體，即使文化資本較高者亦然 (張婧雯, 2017)。另一方面，若干結婚依親的越南女性移民，除須善盡婆家所賦予的生育和照養責任 (鄭詩穎、余漢儀, 2014)，也須扮演越南娘家所期待的經濟提供者角色 (Ha, 2008; Nguyen, 2016)。這些不利條件與預設腳本，可能影響了越南女性移民建立個體身分的歷

---

<sup>1</sup>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2024 年 12 月)〈各縣市外裔、外籍與大陸 (含港澳) 配偶〉統計資料，截至民國 113 年 12 月，越南裔／籍占該資料總人數 19.98%，共 121,153 人，其中女性為 117,149 人，僅次於大陸與港澳配偶 (合計 64.23%)。

程。也因此，探問在臺越南女性移民在社群媒體上的生活敘事，不僅揭示移民經由數位記憶建構跨國身分的可能樣態，尚可深究在臺婚姻移民女性在身分協商時所面臨的課題以及應對這些課題時所做的努力。關於移民與網路上認同建構的研究經常關注社群意識、社會網絡、文化資源近用分享、現身發聲和數位連結等議題（Allmark & Wahyudi, 2016; An et al., 2020; Diminescu, 2020; Gribble & Tran, 2016; Hiller & Franz, 2004; Ignacio, 2000; Le Duc, 2016; Miller & Slater, 2000; Mitra, 1999, 2001）；在臺婚姻移民女性的網路使用研究則以資訊近用、數位培力、社會網絡、少數發聲或公共參與等議題為主（王右君，2022；王敏樺，2022；宗靜萍，2014；周小琪，2021；張郁欣，2023；潘玟卉，2021；Cheng, 2021）。這些研究傾向未及深究同為移出／移入者在雙重對話中所發展的日常敘事與移民生活腳本之間的交互關係，本文研究適可填補上述罅隙，提供有關跨國移民社群媒體使用與身分建構的不同思考向度。

依循以上思維，本文以在臺越南女性移民的臉書（Facebook）敘事為對象，<sup>2</sup> 探索社群媒體如何成為跨國移住者記憶再現與身分協商的空間。語言能力是移民與接待國社會對話的重要資本（Le-Phuong et al., 2022），故此，本文邀請具中文書寫能力、並且以中文和越文發布貼文的女性移民參與研究，以理解雙重對話脈絡下的移民身分協商。透過網路田野觀察和深度訪談，本文就以下問題進行探索：（1）同時身為移民海外者和外來移民，研究參與者如何經由臉書上的日常敘事與母國和接待國生活圈進行對話？（2）在此雙重對話下所完成的自我敘事中，哪些記憶受到排除、壓抑或轉化？哪些又得以揭露？這些選擇性的敘事

---

<sup>2</sup> 據本文前導研究和本文研究參與者的使用經驗，臉書為許多在臺越南女性移民日常交往和生活紀錄中慣用的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 SNS）。《公視越南語新聞》在使用社群媒體推廣近用時除以 YouTube 為網路流通平臺，亦運用臉書推播影音新聞和即時快報（王右君，2022）。

記憶，隱含了何種預設與期待？（3）此一記憶再現的歷程，如何成為跨國移民身分協商的一環？又如何反映、建構敘事者所依循或者追求的跨國移住生活腳本？為說明以上問題的論說基礎，以下文獻探討一節先就敘事記憶、社群媒體以及跨國身分之間的關係予以爬梳，並就在臺越南女性移民的集體處境與身分協商再行探討。

## 貳、文獻探討

### 一、身分認同與敘事記憶

個人的身分認同繫諸生命故事，關於自我存在軌跡的自傳式記憶，則為生命故事的內涵。自傳式記憶涵蓋了日常生活事蹟的情節記憶，表徵了不同時光中的生命經驗；眾多貫穿生活時期和重大事件的各種記憶，構築起生命故事，形成自我概念的基礎（Conway & Williams, 2008）。自傳式記憶的再現，往往經由敘事完成。透過故事述說，人們賦予過往事件形貌、尋找意義，表述自我並與他人建立連結（McAdams, 1997）。透過記憶敘事，人們建立自我身分認同，而諸多圍繞著個人社會關係和生活經驗而生的故事，即令以事實為基礎，卻是一種篩選下的結果；人們選擇性地描述和詮釋生命所座落的時空脈絡、人際關係和生活事蹟，挪用局部經驗創造生命意義，好讓做為敘事的自己和聆聽的他者能夠理解（McAdams, 2003）。在追求個體意義和他人理解的前提下，看似自由的身分選擇，其實是個人依社會、歷史和政治脈絡度量權衡下的結果；同時，因各種社會文化條件的差異，包括種族、階級、族群和性別等，個體所擁有的選擇性，也隨之而異（同上引）。

這也意味著，選擇性的記憶敘事和策略性的身分認同，隱含了依脈絡和處境而異的結構性因素。Berntsen 及其同儕（Berntsen & Rubin, 2002, 2004; Berntsen & Bohn, 2009）關於文化生活腳本（cultural life script）的概念，<sup>3</sup>可供思考社會文化中的成規和期待如何影響個人的生命述說。腳本的概念廣受各方學界闡述，用以探討人們在各種生活面向中依情境和脈絡而定的行動指引和守則，從情感觸發與意義詮釋（Tomkins, 1979, 1987）、日常活動場址中的慣例和儀式（Schank, 1977）、親密行為（如性關係）的發展與建構（Sternadori, 2020）、社會和家庭角色的扮演（Atwood, 1996; Byng-Hall, 1995），到貫穿生命歷程的計畫（Berne, 1975）等，都是腳本概念界說的範疇。在 Berntsen 及其同儕的論述中，文化生活腳本為一種基模，表徵了理想化的生命故事，界定人們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亦規範了事件發生的合宜年齡、順序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例如就學、就業、結婚，成家等，至於何為重要大事、何為合宜時序，則可因群體文化而異，並經由傳統和文化生活傳遞（Berntsen & Rubin, 2002, 2004）。雖然，生活腳本不等於生命故事本身，但卻可能影響其形貌。在引導人們規劃生命進程的同時，生活腳本亦可能左右生命故事納入的元素（Berntsen & Bohn, 2009）。做為一種理想藍圖，文化生活腳本傾向涵蓋普受社會認可的正面事件（例如結婚）而非負面事件；通常，符合腳本定義的事件會受到特意紀錄保存，例如拍照、錄影等，另外，這些事件也較可能在各種社會場址中受到分享與複述，因而更易進入生命記憶保存和闡釋之列（Berntsen & Rubin, 2004）。值得關注的是，文化體系介入個人記憶建構的機制，可能壓抑某些類型事件（例如童年時受到性虐待）的回溯陳述，或者偏好某種版本的表述方式，使得某些聲音在個人敘事中消聲匿跡（Fivush, 2004）。

---

<sup>3</sup> Life script 一詞在本文中依論說脈絡，譯為生活腳本或人生腳本。

假使，腳本暗示了人們建構自我記憶的準則，實質上界入了人們身分建構的軌跡；當人們傾向選擇回溯某些記憶，其人自我身分亦越可能朝向與記憶相連的方位前進。在此敘事、記憶、身分認同以及腳本的互動關係中，個人的主體性又占有何種位置？Tosi（2010）視腳本為一種動態的系統，重新解讀 Berne 的腳本理論，指出人們經由敘事重建腳本的可能性。依 Berne（1975）的原初論說，個人生命的腳本為前於意識、自幼形成的人生計畫，跟隨著生命進程而行，指引行為模式的同時也對個人造成限制。後世學界延伸闡述，探索腳本與「建構和組織現實的普遍態度」（a general attitude to construct and organize reality, Tosi, 2010, p. 31）之關聯性。儘管，腳本可能形成枷鎖，然而，人們仍可揚棄或改寫毀壞生命的腳本，轉求有建設性的版本（Tosi, 2010）。腳本是敘事建構的產物：自傳性敘事在記述個人生活歷程之際，不僅反映了行動者所依循的腳本，亦在內隱／外顯記憶、當下知識與新舊經驗的運作、整合之中，形塑和重塑了人們賴以理解生活和建構意義的腳本，引導人們構築身分認同、預期與他人的互動，以及詮釋各種生命經驗，而此敘事建構的歷程，乃發生於文化脈絡與人際互動之中（同上引）。

承上討論，敘事在個人記憶、身分認同和腳本建構上扮演了關鍵角色，而腳本和敘事之間則具有交互形塑的關係。腳本框架了敘事記憶，敘事記憶則反映和重構了腳本。在生活的規劃和經驗的詮釋上，腳本可能具有暗示和規範的作用；然而，做為生命主體，個人亦具有開啟和重構敘事並藉以形塑和改寫腳本的能動性。身分認同的協商，涉及了敘事記憶，也牽動了腳本形塑和重塑的進程。如上所述，敘事、記憶、認同和腳本建構發生於社會文化脈絡與人際關係之中，若此，跨國移住者所處的身分建構脈絡以及社群平臺中的人際互動模式，又如何影響了身分協商、敘事記憶與腳本形塑之間的交互機制？以下小節將從就此問題

面向進行爬梳。

## 二、社群媒體與跨國身分

個人身分構築於每日生活之中，對當代移民來說，跨國身分的協商，意味著橫跨不同之地的生活世界和情感歸屬（Vertovec, 2001）。個人如何打造空間、開發經驗和採取行動，決定其跨國參與兩地社會場域和建立多重位置的可能性（Levitty & Jaworsky, 2007）。網路傳播科技的發達，毋寧增進跨國活動的資本，裨益移住者保持與母國之間的密切往來（Vertovec, 2001）。

也因此，移民海外者的身分認同，早在網路傳播盛起時即受到學界注目，若干研究以網頁或其它形式構成的網路論壇和虛擬社群為旨，關注網路傳播如何創造一個以母國原鄉為認同核心的社會空間。這類研究彰顯移居他國者意欲跨越地理疆界、與原生之地維持身分依附的情懷，以及傳播科技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探討網路空間如何提供海外移民組織社會網絡、分享資訊與資源、討論共同事務、維繫社會連帶、凝聚國族情感以及展演文化身分（Hiller & Franz, 2004; Ignacio, 2000; Miller & Slater, 2000; Mitra, 1999, 2001）。晚近個人行動上網裝置和社群媒體的普遍近用，令移住他國者更易以個體為中心維繫社群關係、建立跨境社會網絡，或參與社會行動（Allmark & Wahyudi, 2016; Gribble & Tran, 2016; Le Duc, 2016）。對於隻身遷徙、相形孤立的婚姻移民女性而言，社群媒體有助延伸社會網絡，維繫在移入和移出國之間的社會連帶，尋求他人協助或情感支援，以及調處個人做為移民的身分認同（An et al., 2020）。

跨國社群和社會網絡建立之外，數位媒體和網路傳播的發達，也令

移居者更易在肉身缺席下以「連結在場」(connected presence)的方式經營人際關係(Licoppe, 2004)。媒體中介的在場性或臨場感(mediated presence)可溯及書信傳情,透過文字書寫和夾帶照片,人們在身體缺席的情境下,藉由象徵符號表意再現,即便非即時同步互動,亦能令其對話者得以想像和感受其人書寫和攝影時的肉身存在(Bourdon, 2019)。網路科技大幅縮短媒體中介在場所需的時間,並增其可能形式,以個人帳號為中心的社群媒體,則讓每日社交空間成為經營在場性的活動場域。社群媒體將書信傳統即時化和多媒體化,賦予非即時同步的對話新形貌(如個人帳號中的圖文張貼和留言互動),諸如直播和視訊等功能,也令即時同步且身體存在感明確的在場性得以發生(Felton, 2014; Madianou, 2016; Madianou & Miller, 2012)。Diminescu (2020)認為,善用數位中介的在場性,有助改變 Sayad (2004)所說的「雙重缺場」(double absence)困境。<sup>4</sup> Sayad (同上引, pp. 120-121, 125)指出,作為外鄉人,移民在接待國常被視為可能擾亂社會的「課題」,而作為移居他鄉者,不僅身體上離開母國,在道德和精神層次上,最終也將隨著漫長移居歲月遠離母國社會。Diminescu (2008, 2020)則倡言,經由數位裝置進行連結的移住者(connected migrant)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力求在各種不同生活領域與空間之中,與他人形成當下、立即、共時的在場關係,藉此,故鄉感覺不再遙遠,在移居國建立新的連帶似乎較為容易,負面情感和生活壓力也找到宣洩的出口;同時,相較於前網路中介年代,移居者有更多的媒體資本進行跨國參與,轉變在移居地和母國社會皆缺席的處境。據此,經由網路中介建立存在性,成為經營跨國身分的立基點。不過,個人文化資本的有無(例如語

---

<sup>4</sup> 「雙重缺場」之譯詞援引自龔宜君(2019)。

言能力)以及所在社會位階,影響了個人在運用社群媒體參與接待國社會的可能性(Le-Phuong et al., 2022)。善用跨國社會網絡和雙重文化資本者更易改變結構上的不利因素,向上流動(Zhou, 2004),進而提昇本身所屬移民社群的能見度和生活福祉(Cheng, 2021; Le-Phuong et al., 2022);相對地,語言障礙在消滅移住者自我表述機會之餘,也影響其社群媒體上的參與和發聲空間(Le-Phuong et al., 2022; Ullah & Chatteraj, 2023)。

即使具備相應的資本,維持「在場」仍是一種持續性的過程,必須經由各種行動努力維繫(Licoppe, 2012; 轉引自 Diminescu, 2020, p. 75)。社群媒體的多媒體敘事模式和方便近用性,吸引人們援以記錄生活,這種生活記錄,可視為表徵個人日常存在性的具體行動,而本文所欲探究的是,這類在場記事,如何成為自我身分建構的一環?如前行研究所述,在個人帳號中記述分享有關個人的生活,不管是文字或圖像,都是一種自我敘事,也是構築個人自傳式記憶和自我概念的環節(王右君, 2019)。故事述說的場址(site)定義了何者可以述說、何者可受理解,敘事者因而可能依預設期待,選擇述說的內容和方向;另外,誘發敘事者的性質也可能因場址的差異而異,影響敘事者的述說位置、限定敘事所受的規約,或令敘事者處於多重角力之中(Smith & Watson, 2010, pp. 69-71)。場址特質之外,個別敘事者所對話的想像閱聽人(Marwick & boyd, 2011; Ong, 1975),也左右了敘事者的篩選規則。不同於聽眾明確的述說情境,社群媒體敘事的實際接收者,可能因平臺功能和隱私設定而浮動,而對於聆聽他者的想像,則可能影響敘事的內涵:在尋求正面回饋的前提下,發文者可能經由過往經驗或現象觀察,想像其閱聽人的形貌和可能回應,並依此篩選或調整發文內容(王右君, 2019; Marwick & boyd, 2011)。

承上所述，敘事記憶乃身分建構的基礎，社群媒體上的連結在場、敘事記憶與跨國身分建構，成為一種三足並立的關係。對於敘事場址的認知和對話他者的想像，引導了敘事記憶的內容篩選和再現方式，也影響了其人經由敘事記憶建構自我的結果。做為敘事場址，社群媒體的功能特質和使用情境，影響了敘事的形式與內涵。對於尋求跨國在場的移住者而言，經由社群媒體敘事建立自我身分，意味著與兩種閱聽人對話以及雙重篩選的可能性。一方是母國親友和異地同鄉，另一方是移居地的家庭和交往圈，兩者的聆聽位置不同，誘引出的敘事也可能有異。當社群媒體上的敘事記憶成為經營跨國身分的路徑，如何面對兩種並存的對話脈絡，成為一種課題。畢竟，無論是物理性或精神性在場，皆須受到他人感知；當跨國在場不僅受到感知，尚且得到肯認，跨國身分的有效性也方才成立。對於可能承受邊緣處境的婚姻移民女性而言，其在場性能否受到認可，相對來得意義重大。以下小節續就在臺婚姻移民的處境與身分協商再行探索。

### 三、婚姻移民女性與身分協商

移民被視為社會階級流動和經濟資本累積的一種途徑（Palriwala & Uberoi, 2008），包含女性以婚姻方式移民至經濟較寬裕國家的「上嫁」（hypergamy）路徑（黃宗儀、黃佳媛，2023）。然而，對於「上嫁」他國的婚姻移民女性而言，這條道路不見得順遂：為了維繫居留權，婚姻移民往往需要仰賴夫家支持，這種處境也使之居於不利位置，語言隔閡，則令個人對於生活的期待和想望難以言喻（Ullah & Chattoraj, 2023）。「外嫁」他方，通常也意味著必須重新適應他地生活習慣和處事模式，做為外鄉人，尚可能面臨忠誠度和貢獻性受懷疑的問

題，能否受到移居國社會的接納和認同，影響其生存狀況，此外，以原生家庭為基礎的支持網絡是否鄰近可得，亦影響了婚姻移民女性的能动性（Palriwala, 1996; Palriwala & Uberoi, 2008）。社會污名，是流動到經濟相對優勢國家的婚姻移民可能遇到的另一項難題，如何對抗污名並避免予以內化，亦考驗著這些女性移住者（An et al., 2020）。

1980年代以降，在資本國際化和全球跨國婚姻風潮中，許多東南亞籍女性來到臺灣尋求生活出路，而這些來自相對較邊陲國家的女性移民則常在臺灣家庭中扮演生育和勞動的雙重角色（夏曉鶯，2000）。在傳宗接代和照顧家庭的前提下，婚姻移民女性除卻生兒育女、照顧長輩（鄭詩穎、余漢儀，2014），還常被期待具備良好語言能力以及穩定正當工作（范綱皓，2014）。與此腳本設定並行的是，相對邊緣的社會位置。移居初期的語言隔閡和家庭角色限制，阻礙婚姻移民女性在臺擴展社交網絡（林淑玲、蕭仔伶，2007）。對於被認定「上嫁」來臺的女性，臺灣夫家可能投以貧窮想像而貶抑其地位，即使原居地經濟發達的香港婚姻移民女性，亦可能因為被指認為「陸配」而蒙受「上嫁」偏見，必須自證財力以求取尊嚴與地位（黃宗儀、黃佳媛，2023）。至於來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女性則承受了更直接的污名指稱，「商品化婚姻」、「愛財」、「騙錢」、「假結婚、真賣淫」、「逃家」、「有犯罪傾向」，或「受害者」、「社會底層」等，是媒體和社會論述中被放大的刻板印象（夏曉鶯，2000, 2001, 2002；陳欣欣，2020；龔宜君，2019）。「努力當個臺灣好媳婦好媽媽」，成為爭取主流社會認可、維持母國尊嚴的一種方式（陳麗君，2019）。近年新南向政策肯認東南亞移民對臺灣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但也提出新的母職任務，期待新住民女性將新二代養育為多語人才，以利與東南亞國家交往（Lan, 2019）。

做為離鄉人，移民也可能同時承擔母國家庭的期待。傳統上，越南

女性被鼓勵依循儒家理想女性典範，盡職盡孝、為家庭犧牲奉獻（Nguyen, 2016; Truong, 2008），照顧老人、敬重長輩是則是盡孝之道（Wang, 2010）。對於越南女性而言，善盡女性應有美德諸如無私奉獻、堅強忍耐和為人犧牲等，是「做性別」的重要環節，能夠克服困難、展演傳統女性美德，成為建立個人尊嚴和培養力量的根源（Hoang, 2016）。除卻維繫家庭關係、展現美德，越南女性也被期待協助維持家計、在經濟上扮演要角（Ha, 2008; Nguyen, 2016）。不少越南女性背負著照顧原生家庭經濟的責任遠嫁來臺，雖然已建立新的家庭，在孝順父母的前提下，仍須持續維繫原生家庭經濟的責任，礙於傳統越南女性角色和家庭顏面，即令來臺生活不盡順遂，也難以向原生家庭求援（龔宜君，2019）。跨國移民可能面臨叛離母國的指責，在臺越南婚姻移民女性也不例外，除此，尚可能被家鄉認為藉由婚姻進行社會流動，在手段上缺乏正當性（同上引）。

尋求兩地在場的移住人生，代表雙重文化典範和社會框架的考驗。「越南好女兒」和「臺灣好新住民」成為可能必須同時背負的身分，指向兩種不同實現方向的生活腳本。倘若，在臺越南女性移民所追求的，是建立在母國和移居國社會皆受到肯認的身分，那麼，她們也面臨了與兩地社會協商的處境。社會互動涉及了他者的感知以及自我的行動，在此情境下，自我身分的建構，意味著他者印象和個人行止之間的調處：一方面，感知他者對於自我的期待，可能引導了自我的行為舉止，另一方面，做為被感知的對象和身分建構者，自我也力求感知他者對於自我身分的肯定（Swann & Bosson, 2008）。誠如先前所述，跨國移民在社群媒體上與母國和接待國進行的敘事對話，是一種維繫在場性並建構個人身分的雙重行動。當這種敘事建構話語涉及與兩地社會／兩種腳本協商，社群平臺上所對話的想像閱聽人即可能與身分協商中的感知他者重

疊。意即，母國的原生家庭和親友以及接待國的新建家庭與社交生活圈，是平臺上敘事對話的對象，也是身分協商中的感知他者。在尋求正面印象和肯認回饋的驅力下，對於想像閱聽人和感知他者的預設和期待，極可能影響社群平臺上移民生活敘事的篩選法則，進而左右移住生活腳本的形塑與再現。值得注意的是，敘事主體與雙重他者對話協商之際，亦具有擇選和改寫腳本的可能性。為進一步探究在臺越南女性移民在臉書上的跨境敘事與對話，以下一節先行說明本文研究方法以及探究研究問題的分析框架。

## 參、研究方法

本文以使用中文和越文在臉書上發文的越南女性移民為對象，探討其社群媒體上的敘事記憶和身分協商。為此，本研究邀請 11 位符合研究對象定義者參與研究，包含結婚依親來臺移居以及來臺求學或工作後結婚定居者，每一位參與者皆育有兒女，教育程度從高中到研究所（包含在越南和臺灣所受的教育），職場領域包含教育、通譯、行政、社福、餐飲、旅宿、零售、美容保健和製造業，居住地點包含高雄、台南、南投、台中、桃園和台北。研究參與者的招募，主要以兩位越南籍研究助理的社交生活圈和本文作者的人脈為基礎多方詢問邀請，並以滾雪球方式擴大招募範圍。

研究資料的搜集方式包括網路田野和深度訪談。網路田野以了解研究參與者的臉書發文模式、建立個別訪談大綱，以及輔助訪談內容分析為目標，分為兩個階段。訪談前先廣泛瀏覽研究參與者的臉書，了解其慣常發文題旨和發布習慣等，並且回溯搜集過往貼文中敘事性較強且突顯個人生命經驗或情感者，包含單獨以中越文發文和中越文並用者，以

做為個別訪談的提問方向以及訪談分析的輔助資料。訪談結束後，持續追蹤臉書新動態，並依研究者生命歷程和訪談提及的經驗，回溯觀察若干過往貼文。研究參與者臉書帳號回溯觀察期的起始時間點主要視個人發文頻繁程度而定：發文頻率較低者因發文量少，回溯時間較久遠，以便取得更多資訊；發文較頻繁者因貼文數量較多，回溯起始點較晚近。除此，因選擇性回溯，若干發文頻率較高者亦回顧至多年前的貼文。觀察越文貼文時，先以臉書上翻譯功能理解大意，須細讀者則由越南助理翻譯為中文。個別帳號長期觀察旨在了解研究參與者的記事傾向和敘事模式，重點包含：（1）語言使用（中、越文單獨使用或雙語並置；雙語發文中個別語言的順位和篇幅）；（2）符號使用（文字、emoji、照／圖片、影片或直播）；（3）敘事風格和敘事題旨（包含常態和特殊題旨）；（4）敘事中的場景和他人（家人、朋友、同學等）；（5）發文頻率。個別貼文觀察則以上述敘事元素為依據，理解文中敘事所對話的對象以及所欲彰顯和詮釋的生活經驗與情感，進而探究這些經驗、情感在研究參與者個人移民生活上的意義。

訪談以半結構訪談方式進行，依受訪者個人生命經驗、臉書貼文和回覆問題的內容延伸訪題。由於受訪者華語表述十分流暢，訪談以華語進行，其中幾場訪談由越南籍研究助理陪同進行。訪談大綱的共同問題以前行研究和本文研究命題為基礎，個別訪談中的問題則以上述田野觀察為依據，並依前行受訪者訪談內容中浮現的新命題調整後續受訪者的訪題。共同訪談問題方向包括：（1）移臺經歷和日常生活；（2）生命中的重要大事和重要他者；（3）對於臺灣社會文化的感受；（4）臉書使用習慣；（5）發文動機、發文內容取捨和語言使用的原因。藉由訪談提問，引導研究參與者進入以下談話題旨：（1）如何使用臉書紀錄和分享個人從越南移居來臺的跨國生活經驗；（2）臺灣社會對於越南

移民或越南人的印象和對待方式，對於自己有何影響，如何反映於臉書發文之中；（3）使用臉書紀錄分享生活記憶時的心靈感受；（4）發文當下或回顧貼文時，如何感知所紀錄的過往生活經驗和心情，以及反思個人生命意與價值；（5）使用臉書述說生活和心情時，是否會因為在意母國和臺灣交友圈或預期對話對象的想法，轉換或放棄發文；（6）使用越語或中文或雙語發文的原因和方式。訪談內容初步分析時，首先以原初研究命題為參照點，交互比較個別訪談逐字稿，尋找共同生命經驗和敘事傾向，並依此進行初次分類；接續再次檢視各類目中的訪談內容片段，反思原初命題和修正核心論述，重新進行題旨分類。

根據上述觀察分析，田野和訪談中所浮現的共同題旨包含：（1）在臺家庭和社交生活中的美好事蹟；（2）在臺的工作成就和社會文化參與；（3）養兒育女的心情點滴和歡愉片刻；（4）返回越南與家人朋友相聚和出遊的愉悅時光；（5）回憶母國生活和原生家庭，以及記述和分享母國相關事物；（6）作為移民者的身分和處境以及臺越文化差異的比較；（7）特意在社群媒體上排除或隱晦呈現某些不可言說的經驗和情感；（8）臉書上的生活敘事對於個人的意義。藉由交叉檢視研究參與者的共同和個別經驗，本文一方面揭示一再述說和珍視的記憶，一方面探究受到排除、隱藏或轉化的記憶，透過深究敘事者選擇性自我敘事的歷程，省思跨國移民女性在社群媒體上身分協商時所面臨的課題。為保護隱私，參與者在本文以化名顯示，文中提及臉書貼文時以概略描述但不直接引述的方式呈現。11 位研究參與者的資料列表如下，其中一位在研究發想階段已進行初次訪談，另外 10 位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開始進行訪談，本文撰寫期間並依資料所需補充兩次訪談。來臺時間以最後一次受訪時的時間點回推估算。臉書觀察年間的計算，以田野觀察時所搜集的貼文中最早發布者的時間為起始點，並以訪談後持續觀察

期的最後時間點為截止點。

表一：研究參與者資料表

研究參與者 (化名)	來台時間	訪談日期	有效訪談時間	臉書觀察年間
筱秀	10 年以下	2021.12.2	2 小時	2 年
April	10 年以下	2022.1.5	2 小時	3 年
Annie	10 年以下	2022.6.13	1.5 小時	5 年
Linh Chi	10 至 20 年	2022.4.28	1.5 小時	3 年
Sherry	10 至 20 年	2022.8.10	2 小時	3 年
海靜	約 20 年	2022.1.29 2024.3.8	2 小時 1 小時	3 年
芝語	20 年以上	2020.6.9 2022.3.25 2024.3.8	1 小時 1.5 小時 1 小時	4 年
伊柔	20 年以上	2022.7.30	2 小時	2 年
Joy	20 年以上	2022.3.9	2 小時	3 年
小月	20 年以上	2023.3.11	2 小時	2.5 年
Mia	20 年以上	2023.4.1	3.5 小時	4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肆、移住記憶中的雙重對話與身分協商

### 一、臉書敘事與理想移住生活腳本

本文研究參與者皆運用臉書動態時報功能記錄和分享日常生活，並

以 Messenger 和越南家人通訊。LINE 雖然也是慣用軟體，但因越南非主要使用國家，限於與臺灣交往圈通訊，受訪者對 LINE VOOM 的貼文功能也較為陌生，少數幾位（Joy、伊柔、小月）運用該版面推廣在臺工作或事業，日常生活記事仍以臉書為主。至於 Instagram，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是，在臺越南姊妹不太使用，因為社交圈受限，部分受訪者雖然也開設了帳號，但使用度低，性質趨近臉書圖文的第二發布空間。例如，海靜是臉書重度使用者，但過去兩年 Instagram 只發過幾則圖文；芝語也曾開設 Instagram 帳號，因為太少用，連帳號名稱也忘了。使用度較高的小月，近兩年幼女出生後較常在 Instagram 發文，多為女兒的照片和短影音，內容與臉書相仿，但頻率低許多。伊柔近一年來開始積極使 Instagram，發文性質多與 LINE VOOM 類似，主要也是用來推廣在臺事業。

整體而言，臉書在臺越兩地使用者廣、可在單一平臺跨國同步交往，是最主要的日常生活記事空間。中文和越文是所有受訪者皆使用的發文語言，語言選擇多視目標閱聽人而定。不過，一篇貼文中越文並陳，在研究參與者中很普遍，尤其是有關生活中的重要事蹟或好消息，除了讓兩地親友同步知曉，也可避免翻譯軟體失真。至於中越文字的內容和長短，可能依兩地讀者理解事件內涵或者文意的需求調整。筱秀曾發文分享在臺家居大樓誤傳火警、住戶倉皇逃生的經驗，越文部分即生動厚描，因為農村老家沒有這種大樓，要「講細一點」，好讓家鄉的人理解。

這些記述生活大小事的貼文，是研究參與者感受生命愉悅和生活意義的一種方式。儘管來臺移居的歷程和工作領域有異，研究參與者的臉書貼文經常浮現某些共同題旨，包括孩子的成長紀事、個人或家庭出遊以及越南姊妹相聚的景緻、返回越南探親或旅遊、慶祝越南節日，以及

日常居家和工作的即景。

海靜和 Mia 都曾有過硬體設備問題流失重要照片的經驗，自此把臉書貼文當成保存重要照片備份的資料庫，海靜尤其善於運用臉書的分類和搜尋功能回顧貼文。出身於越南山水之鄉，自幼在戶外跑跳長大，海靜經常與孩子分享自己的童年經驗，也努力讓孩子擁有同樣的童年記憶。假日時光，經常是全家郊外出遊的好日子，出遊時必定拍照，留下許多歡樂融洽的畫面，再現了家庭親密情感。海靜說，自從婚後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全部心神都放在孩子健康與家庭和樂上。這種心情，與多位研究參與者相同。家人，尤其是孩子的身影，是多位研究參與者臉書中，除了自己以外最常出現的人物。兒女尚年幼的 April，臉書被孩子的照片占滿篇幅，孩子出生、熟睡、玩耍、參加活動、在學校的小插曲等，都是她以照片和文字紀錄的對象。這些敘事記憶偶爾也夾雜工作、母職兩頭燒的疲憊心情，但整體而言，情感是甜蜜的。芝語的工作忙碌，無暇經常發文，但很喜歡在臉書上紀錄孩子的生活點滴，雖因孩子成長後注重隱私而減少發文，仍不時回顧過往時光。Mia 說，除了工作之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兒女，雖然現在孩子大了，覺得在媽媽的臉書上曝光有點尷尬，但還是忍不住把孩子可愛的照片放上去。

母職與家庭生活之外，關於越南的事物和記憶，是共同的敘事面向。芝語感到，移臺多年，回到母國時已非全然越南人身分，但內心深處對於越南還是有強烈的眷戀。這種海外移民情懷，也見諸研究參與者的臉書。慶祝越南節日、分享年節食物照片，是個人帳號中常見的風景，往往獲得越南同鄉的熱烈回響。另一種展演越南性的方式，是穿著越南國服奧黛出遊或參加活動，並且在臉書上留下美麗的身影。藉由臉書平臺抒發懷鄉和思念家人之情，亦是敘事的一環。父親過世後，Linh Chi 在臉書上思念與爸爸相處的幸福時光；芝語以越語在臉書上記述父

母親的生平事蹟和成就，表述對於父母親的強烈情感。越文書寫之外，孩子說越語的聲音和畫面，也常見於研究參與者的臉書貼文。海靜希望越南成為孩子另一個家，每年帶著孩子回越南去過暑假，幾個孩子都會說越語。小月則說，教孩子說越語，能讓他們更懂她的內心話，母子情感也會更親近。除卻表彰心繫母國的情懷，記述返鄉探親旅程，也是建立精神親近性的一種方式。機場候機、訪越路途、親人合影等歷程，透過照片、短片、直播和文字方式在臉書上留下紀錄。不過，2020年以降因 COVID-19 疫情國境封鎖，一度斷了返家的路，在這種時刻，社群媒體的互動，成為提供情感陪伴的重要路徑。Linh Chi 心念家鄉老母，在無法回國探視下只能以臉書和母親分享近況，聊以告慰，「雖然她眼睛不好，但看了會很開心，有時候會按讚。」

作為跨國移民，研究參與者所期待的幸福生活大都很平實。筱秀原於越南公部門工作，移居來臺後的生活歷程按計畫行進：「小孩生一生」，同時補上臺灣學校課程，然後完成大學學業，到學校教授越語。雖然教學薪資不高，但她覺得很有意義，也很喜歡這份工作。關於何為快樂生活，筱秀的想法是，丈夫、小孩幫忙做家事，有穩定的工作，但不要太忙碌，有錢可以出去玩，也有時間陪小朋友，周末可以出去走一走，不用賺很多錢，夠用就好。她的臉書貼文也反映出自己對於快樂生活的想像，充滿和家人、朋友出門小遊、聚餐或參加活動的圖文。筱秀所期待的移居生活腳本，與許多研究參與者共享：孩子順利成長、闔家安康、可以出遊社交和回越南老家探望，還有一份好工作。看似平凡簡單的幸福感，卻需努力維繫。

相關研究提及，若干越南女性婚姻移民在前景未知的情況下來到臺灣，和命運下賭注（龔宜君，2019）。本文研究參與者 Sherry 對於結婚來臺的看法則是，「女人嫁出去在哪裡都一樣是賭博……如果你運氣

好，就找到一個好老公，運氣不好，就一樣了。」在親友介紹下，她懷著「出來賭」的心情與臺灣青年結婚。受訪時已來臺十幾年，Sherry 在山居生活與工作時光中，交了很多臺灣朋友。她很喜歡直播，也喜歡分享和回顧孩子成長與自己出遊的照片，覺得自己「就是靠這種回憶過來的」。對於自己的移居人生，Sherry 說工作是很辛苦，比在家鄉的姊妹還辛苦，但每個人都是辛苦過來的，現在沒辦法選擇，而且重新選擇也不見得比較好。對她而言，「孩子乖，健康長大，就覺得值得了啊。」她說，工作雖然苦，但是她的精神快樂，難過時唱唱歌就好，臉書上也留下她唱歌歡聚的畫面。

Sherry 經由臉書再現生活中的美好記憶，藉以維繫自己在臺移民生活的幸福感受。事實上，選擇性記錄吻合自己理想移民生活腳本的事蹟，是研究參與者之間共同傾向。這種選擇性記事，不僅發生於以越文發文者，也出現在以中文表述者；對於在越南和臺灣皆擁有交往圈的越南女性移民來說，以中文和越文發布貼文，不僅是向不同語言使用者傳播訊息，也是分別與故鄉親友／在臺越南同胞以及臺灣交往圈對話。對話情境中的想像閱聽人有異，敘事記憶的篩選法則也不盡相同。如前所述，跨國移民在社群媒體上的敘事記憶，一方面建構個人的生命故事和身分認同，另一方面也經營了母國和移居國兩地的在場感，而這種雙重存在性的經營，則涉及與兩地社會協商跨國移民身分的樣態。以下兩小節分別就兩種對話情境下的敘事記憶與身分協商進行討論。

## 二、與越南母國對話

就功能而言，臉書貼文多少取代了傳統書信，讓移民女性可隨時向越南家人親友分享生活、保持連繫。不管是文字敘事或照片影音，這些

貼文都創造了鮮明的臨場感，移民女性即使人在臺灣，也能即時傳遞畫面和訊息、與母國互動。幾位研究參與者說，除了越南家人親友，臉書也是和散居他國的同學朋友交往的工具。許多以越語書寫的貼文，亦是以此多重對象為想像閱聽人。這種兼具「報平安」功能的自我敘事模式，使得研究參與者的臉書貼文出現一種相似趨勢，也就是若干受訪者口中的「報喜不報憂」。

來臺時間超過 20 年，Joy 婚後幾年即因丈夫健康因素，獨力承擔照顧家人孩子的責任，並在照養之餘尋找工作機會賺錢維生。曾經，當孩子尚年幼，Joy 在越南雙親期望下帶著孩子回母國與父母親居住，但僅維持了半年即返回臺灣。她說，父母心疼她受的苦，所以給了她非常多的愛，但是她感到，父母親把愛和心力都給了她和孩子，哥哥姊姊也為她付出許多，不該讓家人為她犧牲，於是決定回臺，「他們給我的愛太多，給我的包容太多，我認為我應該去承擔我的人生，不是他們來分享我的痛苦。」她說，父母曾經來臺小住，探望她和孩子。親睹她的生活困境，父親每日寫信給她，但在父母離臺後，Joy 把這些充滿愛與苦痛的書信燒成灰燼，也決意告別過往苦悶情感，走一條「更堅強的路」。夢想站在講臺上的 Joy，現在擔任學校和社區的越語教師，並常在演講中以自己的人生故事鼓勵他人。近年，她投入越南文化推廣工作，雖然家庭負擔繁重，仍在社會團體中擔任志工或要職，為小孩、老人和新住民無償服務。Joy 臉書發文頻繁，再現她在生活、工作和社會服務中的正向能量，伴隨了感恩和勵志的話語、正面心情的表情符號（emoji）和充滿笑顏的照片。Joy 為自己改寫的女性移民腳本也為雙親帶來安慰，「我家人只知道我過得很好。」

快樂是一種選擇。海靜說，她也曾經「擦著眼淚過生活」，因為娘家遠在越南，無法協助她早期在臺移居和育兒的生活。看著孩子的笑

顏，她決定像孩子一樣快樂過日子，不再延續頭痛心累的日子。「我從來不會在 FB 上表示我不快樂的事情」，海靜說，臉書發文是要讓家鄉的父母家人和同學朋友知道自己在臺灣過得很好，如果有煩惱，就自己想辦法處理。海靜與 Joy 選擇在臉書上表徵正面記憶，實現個人所追求堅強快樂的人生腳本。然而，報喜不報憂的自我敘事，也意味了負面生活記憶的排除。Joy 說，承受不住時，她會寫信，「信裡都是淚水，有淚水的時候就糊掉了，就不會寄出去。」至於臉書貼文，她會選擇在抒發負面心情後先不發布，等處理完自己的情緒後，再回頭刪除。在尚未開始使用臉書之前，Mia 會把不快樂的事寫在一張紙上，寫完了就丟掉，有了臉書帳號之後，她開始把臉書當成心情手記。不想被人同情，也不希望自己不開心的事成為他人傳聞閒聊對象，遇到太極端或太負面的事時，Mia 選擇「一個人關起來想」，但若覺得只是「心情下了雨」，她會用不說明事物細節但梳理其意涵的方式去書寫，「我一些好朋友，他會覺得說我在作文，……不是在抒發心情，所以他們也不會問你是發生什麼事情。」Mia 期望，不管是現實生活或臉書形象，都要與理想一致、妥善控制，貼文的文字要修飾，自己的心情要調整。海靜則認為，裝出來的幸福，很容易被看得出來。除卻保存和再現快樂的記憶，海靜說自己會從實際生活行動中調整步調和心情，讓臉書反映出自己真實的狀態。

這種力求線上敘事與線下生活合一的自我期待，反映了個人在統合個人身分認同上的努力，也指出敘事記憶與生活腳本交互建構的可能性。上述經驗顯示，依照自己所欲追求的生活腳本，揚棄或調適苦楚情感，轉向正面積極、肯定存在價值的記憶敘事，非但改變他人眼中的自我再現，也再次確認自己擇選的腳本，引導了未來情感詮釋或生活實踐的行動準則。對於若干研究參與者而言，選擇堅強快樂的腳本，不僅是

為了告慰遠在母國的家人，也可能因為實質上無可依靠。

小月初次婚姻結束時，前夫交出孩子的監護權，也把養育責任放給了她。失婚後的小月在奧援難求的情況下，隻身工作賺錢養育孩子。小月經常發文，但不談自己的勞苦。她說她個性堅強，不想依賴臉書找安慰，況且她的難處是很實際的財務面向，別人也幫不了忙。這種單打獨鬥的習性，一方面出於第一段婚姻受挫中所培養的韌性，另一方面也因越南家人的期望而不得不然。走過艱辛歲月，小月以協助改善移民和移工在臺處境為念，經常接觸沒有資源的移工和資訊不足的新住民姊妹。在這種情況下，小月覺得自己更有義務要堅強，因為「什麼事情人家都找我來去詢問，或其他姊妹都來詢問我，…人家都等著我去幫忙，我不能這樣子把它倒下去啊。」苦於原生家庭經濟責任帶來的處境，情感豐富、容易落淚的 Mia，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對於生活、工作和他人都熱情且善良的人，但不可軟弱。她說自己想成為「鋼鐵人」，卻也說，強壯、無淚，不是本性，是「現實的生活」、「現實的社會」打造出這樣一個人。

克服難以向越南原生家庭求助的處境、展演堅韌向上的生活腳本，這些行動反映了研究參與者母國文化中的女性美德典範：以家為重、堅忍盡職。依訪談所示，不要造成父母的煩惱和負擔、讓他們為自己感到開心，是研究參與者普遍共享的心情。做為背井離鄉的移居者，努力照顧自己，也是盡孝的一種表現。在傳統美德和孝心考量下，以母國家人為閱聽人的敘事，必須報喜，艱辛的記憶，只能排除於外。

原生家庭之外，母國同胞也是正面移民敘事的想像閱聽人，「在家鄉面前維持尊嚴」，是另一個避免在臉書揭露移臺生活負面事蹟的重要原因。「有好的我就放，難過的我自己吞下去」，Linh Chi 發文時通常只放開心愉快的照片和文字，避免「在越南就已經過得這麼不好了，在

這邊怎麼可能更好」的譏笑。她的心得是，除非是真正的好朋友，才可能會同情自己，否則，把自己的苦事告訴別人，反而招來他人幸災樂禍。私心希望自己的生活為家鄉友人所肯定，筱秀說，自己移民來臺後擔任教師，越南朋友覺得她很厲害，令她感到很滿足。她不想在臉書上談個人在臺家庭生活中不開心的事，免得越南舊識看到了說，「你看，在這邊工作好好的，是公務人員，不要，辭掉，嫁那麼遠幹嘛？然後過得也不好，過得不是跟這邊一樣嗎？」伊柔直言，當初母國家鄉的舊識不看好她的婚姻，或是認為有交易成分因而看輕她，或是以為她被賣到有一夫多妻的中國地區，每次回越南時都會遇到「很多問號」。從小生活坎坷的她，原本就養成自立自強的習慣，看淡生活的挫折，加上不想招來故鄉舊識的嘲笑，臉書不提個人生活中負面的事。

當初來臺灣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逃避嘛，第二個是換環境，來去重新再來。那你重新再來，你不能讓人看到你太「落漆」啊，<sup>5</sup> 不能讓人家看到你太墮落嘛…林清玄，那位作家，他是用臺語說的啦…趣味的東西，多說一點…那辛酸的棉被蓋一蓋，哭一哭就好了…反正你難過的東西，你說出來，別人也是當一個笑話而已。（伊柔，訪談紀錄，2022 年 7 月 30 日）

除卻避免負面揭露，和母國友人分享在接待國的好生活，也是維繫移民生活正面觀感的方式。April 在越南完成大學教育後來臺工作，與丈夫相識相戀、結婚定居，並在臺取得碩士學位。當年，April 的父母曾聽聞不少臺越婚姻的不利消息，例如丈夫年齡老邁或重婚等，一度反

---

<sup>5</sup> 此段訪談中夾雜臺語和華語，「落漆」為臺語用語，在此言語脈絡的字義為「出糗、遜掉了」（《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無日期）。

對她與先生的交往，直到先生和公婆一起隨 April 返回越南拜訪家人，才被說服。為了讓越南親友對臺越婚姻改觀，April 在臉書上分享不少臺灣的好消息，包括各種便利的公共設施和進步的社會福利。在臺生活中，Sherry 多少因為越南裔身分遇到不是太開心的事，但她選擇發文述說在臺灣的好人好事。她曾在臉書中分享自己自助洗車受到善心幫助的小故事，Sherry 說，分享這些故事，主要就是讓越南親友知道，臺灣也有那麼好的人。

不過，避談負面事蹟和心情，讓故鄉的人覺得自己在移居地過得不錯，並不意味必須誇示自己在臺灣的生活。幾位研究參與者提及，或是為了顏面，有些越南姊妹會在臉書上展示寬裕生活，但自己會避免張貼有炫耀之嫌的照片或文字。任職主管的 Linh Chi 說，自己少年時努力工作，終日辛勞仍薪資微薄、生活困頓，來臺灣後翻轉命運，找到新生活 and 好工作。對於自己移民後向上流動的生命歷程，Linh Chi 感到很慶幸，不過，關於如何在臉書上再現移民人生，她傾向保守行事。性情活潑的 Linh Chi 喜歡聚會和出遊，也喜歡分享自己外出社交的好心情，但是一度壓抑自己在臉書發文的欲望，免得讓同鄉人覺得她在炫耀人生。Linh Chi 在臺工作和生活中結交許多臺灣朋友，在臺越南交往圈以親友為主，發文時經常中越文並用，有時只用中文發文。因為有越南朋友說她「都不用越語寫了」，Linh Chi 開始改以越語為主要發文語言，以免越南友人說「明明是你越南人，幹嘛要放國語（中文）上去」、「明明之前在越南很可憐，然後去國外就當作很好那樣，好像忘記你從前是什麼人嗎？」相對地，Linh Chi 比較不擔心臺灣朋友對這些事的看法，覺得他們可以理解她的越南人身分。

上述敘事法則，反映了研究參與者做為跨國移民在母國同鄉面前的合宜腳本：在外鄉維持體面生活，但不可自視高人一等，以免讓故鄉人

感覺精神上受到背離。低調得體，是現身在場的安全策略。這種敘事策略，反映了臺灣和越南跨國婚姻中的社經流動因素。越南女性經由婚姻移民到臺灣雖然可能被視為「上嫁」，然而，越南同胞仍可能對於外移者在臺的婚嫁對象和實際生活景況抱持懷疑，或者質疑其人對於故鄉的忠誠度。因而，面對家人之外的母國想像閱聽人和感知他者，移民敘事的「好腳本」必須在「報喜」和「避免炫耀」之間找尋平衡點，而這種平衡點的建立，則在臉書使用經驗中得以觀察和確認。

儘管原因不同，在以臺灣交往圈為主要對象的貼文中，研究參與者也傾向謹慎經營發文內容，以下一節就此進行爬梳。

### 三、與臺灣新鄉對話

本文以雙語發文者為對象招募研究參與者，受訪的女性移民中，若干在來臺前即因學校教育或自學習得華語口說和中文書寫，有些則在漫長移居生活中培養出優異的華語／中文能力，以中文在臉書上與臺灣家人、朋友和生活圈對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海靜即說，「分身兩個人、兩個國家」，同時用中越文發文，是自己經營臉書動態的慣習。

研究參與者中有多位移居歲月已將近或超過二十年，在臉書和訪談中皆表述了對於臺灣社會的情感和融入；越南、臺灣，兩邊都是家，而生活重心所在的臺灣，成為個人生命力實踐的主要空間。Joy 在臉書上把臺灣稱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來臺超過二十年的她，人生大部分的成年時光都在臺度過，華語口說流暢，中文書寫純熟，最感信心的語言則是臺語，因為這是她在臺灣社區服務和分享個人生命故事時與長輩們溝通的語言，也在此語言使用經驗中得到肯定。她說，這些老人家對她非常疼惜，有位年過九旬的長輩還和她一起回越南，只為拜訪教養出這位好

女兒的父母。有感於自己生命故事的正面感染力，Joy 期許以臉書「散播愛」，讓自己的善行義舉影響更多人，讓社會「更多人願意去付出愛」。Joy 發文經常中越文並陳，如同越文發文，Joy 的中文記事也充滿樂觀向上的話語，鼓舞人們以溫暖和真誠的心靈，追求進步並實現夢想。

然而，能如同 Joy 般在臺灣生活圈中得到全然接納，並不容易。伊柔也曾經在臉書中稱臺灣為第二故鄉，熱心參與社會之餘，尚且運用社群平臺協助推廣公益和扶助活動。儘管全心投入臺灣生活，伊柔隱約察覺，不管在社會關係中或職場上，自己的忠誠度仍可能不受信任，或被當成外人看待。婚後早已歸化，伊柔對於「新住民」的稱謂有所保留，希望自己被當成一般國民，不想被區分進特定類目。Mia 在臺居住的歲月已超過在越南的日子，她說自己非常融入臺灣社會，中文書寫表意嫻熟成度甚至超過越文，使用臉書表達內在情感時更常以中文書寫。但是，在日常交往經驗中，Mia 仍意識到，自己的越南移民身分影響了臺灣人與她深交的意願。

這種隱性排除感，對研究參與者們而言並不陌生。伊柔和 Mia 的經驗顯示，即令努力融入和參與臺灣社會，或已歸化入籍，越南女性移民還是不易受到接納與信任。此一處境多少與東南亞婚姻移民的刻板印象有關。在 April 的經驗中，臺灣長輩們聽到越南和越南婚姻移民時，常給予「落後」、「嫁來騙錢」的評語。海靜最常遇到的刻板問題是「來臺灣以後寄多少錢回越南」，但事實上她從未需要寄錢回家，反而是剛來臺時尚未就業，家人體貼寄錢給她。這類因越南移民身分而生的負面記憶，罕見於研究參與者的臉書敘事，一方面是考量母國閱聽人的觀感，另一方面也出於移民在接待國社會謹言慎行的態度。筱秀認為，臉書是一個訊息四散之地，而且很容易在轉傳之間被加油添醋變成不一樣

的意思，所以發文要謹慎，尤其避免書寫有關臺灣的負面文字，免得讓人覺得自己在批評。她也不希望臺灣人用刻板印象看待異國婚姻，認為「跟越南人結婚就是這樣」。喜歡出遊的 Linh Chi 曾在旅途中遇到對越南人不甚友善的言語，在臉書記述遊歷時，她選擇略過不提，只分享快樂出遊心情的圖文。這類選擇性再現，反映了她對於臺灣社會和鄰里歧見的應對模式，亦即，不出聲抱怨，把自己做好，讓人改觀：

我是來這邊好好一個家庭，然後努力工作，認真賺錢，顧娘家、顧母親，小孩也照顧得很好，我的公公婆婆跟我先生就很有面子。因為之前有人都會覺得娶到這個外籍好丟臉，但我就要讓他們知道，臺灣本地的人能做，我也努力做。（Linh Chi，訪談紀錄，2022 年 4 月 28 日）

在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中，越南近年經濟發達以及新南向政策等因素，多少改變了越南移民及其母國文化在臺灣的地位，但若干刻板印象仍然存在。Annie 在臺完成碩士學位後與臺灣人結婚定居，從事白領工作，雖然來臺時間已較晚近，還是遇到不少對於越南好奇但帶有偏見或刻板印象的提問。剛開始她很在意，但學著看場合說話，儘量不去多談。不過，向來保持低調、不習慣在臉書公開揭露太多心情的 Annie，曾經轉傳了一篇述說在臺越南人處境的文章，替代自己發聲。經由轉發文章，Annie 以避免自我揭露的方式和臺灣交往圈對話、傳達隱而未言的內心想法，策略性地回應了自己感受到的隱性歧視。

關於排擠和歧視，研究參與者多半傾向隱而未言或委婉回應，但無法壓抑的情感畢竟很難沉默，在某些關鍵時刻，海靜選擇在臉書上揭露。海靜認為，拿到臺灣的身分證就是這裡的國民，但自己確實在越南出生，對於越南文化背景感到自信，也很喜歡穿著越南國服與黨參加各

種活動，並在臉書上留下影像紀錄。對海靜而言，臺越雙重認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也教導孩子不需迴避。至於「新住民」的稱謂，她不覺得是個問題，因為本來就是新來的住民，不要「把我們想得那麼壞」就好。擔任志工多年，海靜曾在電話服務時因為口音被誤認是在詐騙，也曾被人視為「外籍」而不受信任。她說，會在臉書上提這類的事，主要是和在臺越南姊妹們分享討論，不會因此影響快樂當志工的心情。然而，當自己的孩子因母親的越南族裔被認為「不夠臺灣人」時，海靜感到非常難過，忍不住在臉書上訴說。海靜說，早期來臺時被稱為「外籍新娘」，後來被稱為「新移民」和「新住民」，她以為，在名稱轉換的過程中人們的觀念已經改變了，但沒想到還是會發生這樣的事。避免讓越南家人擔憂，海靜選擇僅以中文陳述此事，期望臺灣社會理解新二代：

孩子才這麼小，被打擊的話，他真的會很受傷。你知道嗎？那時候臺灣政府還沒有像現在那麼關注新住民跟新住民二代。所以那時候就是孩子回來，哭著說，媽媽，我今天發生這樣的事…他也是一個臺灣的子女，那你要跟他相處，你不要去用這個來刺激他嘛…（海靜，訪談紀錄，2022年1月29日）

不管是刻意遺漏、低調敘事，或者難忍直言，這些不盡吻合快樂移民腳本卻又無法真正排除的記憶，說明越南女性移民在臺灣社會中建立存在意義時所受的挑戰。這種挑戰不僅來自跨國移民常被視為外來者的處境，也出自臺灣社會長久以來關於東南亞女性移民的負面論述。承受上嫁淘金偏見之餘，尚且背負各種集體污名，在臺越南女性移民在接待國社會中經營廣大信任圈並不容易，而這種信任圈的建立，也常是謹慎維繫的結果。如此一般與臺灣社會的身分協商，橫跨了日常生活實踐和

社群媒體中的敘事記憶，意味著，以臺灣為想像對話對象的生活腳本和敘事腳本，也必須保持積極正面，讓兩者腳本一致，儘管在此過程中，難免有偏離腳本的時刻。

除卻刻板印象和外來者身分，另一個越南女性移民常須協商的是，臺灣社會為東南亞裔婚姻移民女性預設的腳本。完成生育任務、好好照顧家庭，並且工作補貼家用，是許多婚姻移民女性在臺灣家庭中的指派任務（范綱皓，2014；鄭詩穎、余漢儀，2014），至於個人成長和社會參與，則不在此腳本之內。新南向政策或許提升東南亞裔新住民的地位，卻也基於母職任務的期望（Lan, 2019）。誠然，育兒的喜悅，是研究參與者臉書敘事中的常見風景，然而，這並不意味其自我期待僅限於母職或家庭照護。來臺超過 20 年，伊柔自學中文並且在臺完成大學學業後進入專業職場。她說，婆家當年希望她「在工廠當員工，然後朝八晚五，然後相夫教子這樣子就好了」，但這並非她所欲追求的人生。自結婚依親來臺的第一天，看到夫家所在的鄉間環境，伊柔心裡便有了讀書求上進的想法。只不過，掙脫限制、實現理想，還是得先完成許多婚姻移民女性被賦予的腳本。「那時候沒有生兒育女的話，你其實別說讀書，你連那個在家裡的立足之地都沒有了」，伊柔說，就算生了孩子也得等他們稍微獨立、自己也有了一定經濟能力之後，才有辦法做想做的事。伊柔的臉書敘事腳本，與她在臺追求個人自我實現的腳本相互疊合：在研究觀察期間，伊柔的臉書動態多為個人工作成就或身心成長的日常紀錄，罕見關於臺灣家人或家庭生活的記述，至於照片也以個人獨照為主。

伊柔中文文辭優美，早已成為個人慣用語言，臉書上的成長記事也常在中文語境中傳達。融入臺灣生活、憑一己之力追求向上流動，伊柔對於「新住民」一詞持保留態度，除卻歸化之心，也因為此一類目經常

被視為弱勢群體，但她不覺得自己是弱勢，也不希望他人如此看待，如果一定要區分，寧可被稱為「越南人」。至於他人對於自己中文能力的讚美，她並不特別欣喜，因為讚美的背後隱含對於能力的假設。這種不想被臺灣人小看的想法，也是小月追求個人成長時的動力。小月說，當年考取專業證照時，就是懷著不能讓人看低新住民能力的心情努力衝刺。相較於其它研究參與者鮮少論及移民負面處境，學習法律知識並且協助移民／工爭取權益的小月，臉書上除了紀錄自己在協助他人中的歷程與見聞，也以中文發文指出公部門在處理新住民和移工事務上有待改進之處，好讓臺灣友人知曉。走過失婚，小月在第二段婚姻中重建家庭生活，同時多方經營工作場域、積極公共參與。媒體再現經常將移民描述為受害者（夏曉鶄，2001；Nikunen, 2020），臺灣新住民在媒體報導中也常被放入弱勢和底層框架（陳欣欣，2020），這種受害者／弱者腳本，不在小月的選項之列。相對地，她選擇站在保衛同鄉人權益的位置，也在此位置上協商自己的跨國身分：在臉書上稱自己為越南女孩，當臺灣在國際賽事中獲勝，小月也以國民身分在臉書上灑花歡慶。

建立跨國存在的歷程中，臺灣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逐漸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芝語說，來臺多年，很多事的想法越來越像臺灣人，包括性別意識。「臺灣女生比較好命」，是研究參與者提及臺越兩地文化差異時的共同想法，相較之下，越南女性要承擔更多家庭責任，還須顧及父母的顏面。Annie 當年懷著「逃婚」的心情來臺讀書，她說，在家鄉，女孩子二十歲出頭尚未結婚，對於家人而言就像「家裡有一顆子彈」，得儘早嫁掉以免丟臉，在臺灣，父母很疼愛女兒，女孩也不會受到那麼多限制。Annie 的人生沒有按照越南家人的邏輯走，也決定像臺灣人一樣把女兒當公主疼愛，雖然在臉書保持低調，但分享了許多關於女兒的圖文，因為「覺得小朋友太可愛」了。不過，臺灣女性主體意識的內

化，也可能需要一些協商。April 認同臺灣女性獨立、自由的態度，這也多少影響自己的自我敘事。曾經，她因為一時感情失和，傷心之餘到臉書發文傾訴，結果引來臺灣好友殷殷關切，令她察覺到臺越兩地女性的差異。出於對臺灣女性朋友圈的理解，April 自此避免在臉書揭露這類心情，免得情感上顯得「好像很脆弱」。

參與臺灣社會、建立信任圈，與刻板印象和既定腳本協商，找尋移民者的有利位置並融入接待國社會的意識與信念，這些生命經驗，銘刻於選擇性的敘事記憶之中。臉書上與中文交往圈的對話，體現了研究參與者建構理想移民者身分的努力；敘事不僅再現了記憶，也印證和構築了肯認自我價值的腳本。芝語的臉書展現了生活中的各個場域：家庭生活、兒女成長、工作成就，以及各種精采遊歷和社交活動。這些敘事記憶映照了她長久以來在臺生活中的自我期待：認真扮演生命中的各種角色。這些年間，她也曾承受刻板印象和異樣眼光，但她相信，努力在各種生活場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是建立自尊的最好方式，而她所追求的，並非他人肯定的眼光，而是踏實的移住人生。此一身分協商位置也彰顯了，個人腳本的建構，終究可能超越關於他者肯認的追求，向上提昇至訴諸內在安適的力量：

我不是做得讓別人來肯定我，但是我就覺得……不管是住在哪裡，……我一定要過得幸福，我的家人才可以幸福，那我一定會變成一個開朗的老師或者是親切的老師，那學生才喜歡上你的課。就只是把你的角色，你扮演的角色做好，我覺得很重要。（芝語，訪談紀錄，2020 年 6 月 9 日）

## 伍、結論

敘事再現記憶，記憶建構自我身分，而身分的協商和肯認，則在與感知他人的互動中完成。當跨境生活成為日常，數位傳播和社群媒體在形塑媒體中介臨場感之際，也提供了跨國移民同時在母國和接待國建立存在性的路徑。個人社群媒體帳號上經由文字、圖像和聲音符號組成的生活敘事連續體，一則表徵敘事者的生命記憶和身分建構的歷程，一則與敘事聆聽者對話，並在訴諸聆聽／對話者的感知和理解中，體現個人所欲實現的生活腳本並協商所欲打造的身分。跨國移住帶來雙重聆聽脈絡，一方是移出的母國，另一方是移住的接待國，不同的對話對象，意味著不同感知他者的預設與期待，也衍生了不同的協商脈絡。

作為跨國移民，在臺越南女性除外來者的邊緣化處境，尚背負母國族裔在臺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若干越南女性婚嫁來臺後，或須協助原生家庭經濟，或者難以向娘家求援，或受到母國同胞的質疑或冷眼。在此脈絡下，參與本文研究的 11 位越南女性移民選擇在自己的臉書平臺上留下美好的跨國生活記憶：子女可愛的容顏、在臺家庭和工作中值得紀錄的事蹟、出外遊玩的愉悅景象、返回越南團聚的行旅足跡，以及記述越南生活和穿著越南國服的美麗身影。這些時光碎片的再現，交織出敘事者在越南和臺灣生活圈中所建立的自我身分，也體現了個人所追求的移住人生腳本。

此般可資維繫幸福感受的敘事記憶，隱含了敘事者在雙重聆聽脈絡下與感知他者對話、協商下的軌跡。以越文發文、與越南家人和交往圈對話的臉書貼文，除卻記錄個人生活歷程、維繫與故鄉的情感連帶，尚且負有回報個人在臺生活狀況的任務。不要讓父母掛心、不能拖累家

人，即使有苦也獨自承擔、不要公開述說，盡職的女兒必須堅強，依靠自己在異國立足，讓家人認為自己在這裡過得好。離鄉遠去的人，不能也不想向母國家人和交友圈訴苦，因為不能讓家鄉同胞看輕，所以，就算不是粉飾太平，至少隱去黯淡無光的一面。為免引發同鄉人不悅或批評，還得避免落入炫耀移民生活之嫌，謹慎經營適中合宜形象。以中文發文、與臺灣家人和交友圈的對話中，再現了自己在臺灣日常生活和社會參與中值得存留的記憶，也淡化了若干因越南族裔身分而生的負面處境。在經營移居地信任圈和尋求接待國社會肯認的前提下，保持靜默或隱晦敘事，雖是維繫和諧關係的一種策略，卻也不盡然是唯一守則。為建立跨國移民身分正當性和維繫移住社群生存權益，仍可偏離低調敘事腳本，訴諸在臺社會網絡的理解。

前行研究指出，在臺越南女性婚姻移民因為家庭顏面，面對母國傾向報喜不報憂（龔宜君，2019）；在關照家人情感的前提下，跨國家庭經由社群媒體維持在場性和親密情感時，可能小心選擇適合揭露的內容（Alinejad, 2019; Leurs, 2019）。本文研究發現，在雙語對話脈絡下，在臺越南女性移民在臉書上建構報喜不報憂的敘事腳本，不僅出於告慰家人或尋求感知他者認同之心，亦發自個人對於幸福生活的追尋。自我敘事反映了敘事者所體現或期待的生活腳本，當敘事記憶成為維繫正面情感與肯認自我身分的路徑，敘事者也在確認生命意義的當下再次穩固了腳本。快樂和幸福的情感腳本，可以是一種選擇，在生命經驗的詮釋與記憶再現的敘事之中完成。同樣地，自信與自尊的身分，也可以經由生活腳本的實踐與敘事記憶的建構予以體現。在移出／移入者雙重身分下的雙軌對話中，參與本研究的越南女性移民捨棄了犧牲者或他者腳本，力求喜悅和尊嚴的生存之道，而社群媒體上的敘事對話空間，則在裨益跨境在場之際，提供建構和體現快樂自尊腳本的平臺。

這種跨國身分協商模式，意味了排除和轉化的過程。理想腳本的維繫，需要具體行動；篩選或修飾未盡吻合腳本的經驗記憶是一種策略，轉換經驗詮釋的法則並且重建生活實踐腳本，則是更積極的方案。對於本文研究參與者而言，社群媒體上的敘事記憶再現了理想移居腳本的實現過程，尚且銘刻跨國女性身分協商的痕跡，儘管歷程中有所妥協和壓抑。如前所述，生活腳本框架生命歷程、暗示敘事記憶的方向，跨國移民女性可能因移民情境面臨多重且較嚴苛的腳本；個人社群帳號中的敘事對話空間可供個人體現或建構腳本，而做為生命主體，敘事者具有選擇或改寫腳本的能動性。在臺越南女性移民的案例顯示，經由移住生活中的廣泛經驗，移民女性建立對於母國和接待國兩地感知他者的理解，將諸帶入個人社群帳號閱聽人的想像範疇，並在具實經驗中穩固或重建此一想像。這些想像影響了敘事者個人腳本的擇選，共構了集體腳本所同享的面向；在雙重協商的動態過程中，敘事主體尋找個人所欲望以及可資體現的腳本；而決定敘事腳本最終形貌的是，敘事主體決意主導自我腳本的意志、對於移住生活的期待，以及依此期待與感知他者／想像閱聽人協商的位置。

在探究移住記憶、身分協商和社群媒體之間的交互關係之外，本文研究也揭示了在臺跨國移民女性可能面臨的處境以及跨越難題時所做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社群媒體雖然方便近用，然而，能善用平臺，以雙語書寫、對話，仍需相當的文化資本。本文印證了文化資本在跨國移民數位連結和媒體中介在場性的意義，並表彰其可能展現模式，至於數位和文化資本相對較為缺乏者能否經由相似路徑協商跨國身分，則有待探索。另外，因研究目的與時程，本文網路田野限於深度訪談之輔助觀察，未能進行數據性分析，訪談亦未以長年多次訪談為主，較難追蹤個人歷時經驗變化，不足之處，尚有待未來相關研究闡述。

## 參考書目

- 《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無日期）。上網日期：2025 年 2 月 10 日，取自 <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14403/>
- 王右君（2019）。〈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新聞學研究》，141，39-81。 [https://doi.org/10.30386/MCR.201910\\_\(141\).0002](https://doi.org/10.30386/MCR.201910_(141).0002)
- 王右君（2022）。〈移住社群的媒體參與：以公視《越南語新聞》為個案研究對象〉，《中華傳播學刊》，42，263-296。 <https://doi.org/10.53106/172635812022120042007>
- 王敏樺（2022）。《探討新住民數位發展對主觀幸福感之影響》。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wvmycc>
- 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2024 年 12 月）。〈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上網日期：2025 年 2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sdate=200101&edate=202308>
- 林淑玲、蕭仔伶（2007）。〈台灣之女性新移民健康照護的社群隔離現象〉，《護理雜誌》，54(4)，67-72。 <https://doi.org/10.6224/JN.54.4.67>
- 周小琪（2021）。《新住民女性健康資訊需求與資訊行為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86kffg>
- 宗靜萍（2014）。〈女性移民資訊尋求行為與家庭傳播型態應用之研究〉，《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2，51-7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40820002-201412-201505120013-201505120013-51-74>
- 范綱皓（2014）。《成為臺灣好女人？越南新移民女性的空間化認同政治》。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vcs2c8>
- 夏曉鶄（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009.0002>
- 夏曉鶄（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3-196。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109.0008>
- 夏曉鶄（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

究雜誌社。

- 陳麗君 (2019)。〈臺灣新住民家庭中公民權、語言認同和協商——公私領域的交界〉，游素玲、陳麗君編《亞洲婚姻移民女性：移動與能動》，頁 209-228。國立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
- 陳欣欣 (2020)。〈從新聞產製談新住民女性刻板印象研究〉，《數位與開放學習期刊》，8，167-195。https://doi.org/10.6748/JOEL.202004\_(8).07
- 張郁欣 (2023)。《新冠疫情期間東南亞籍新住民的防疫資訊行為—以越南、印尼與柬埔寨的個案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論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d783sv
- 張婧雯 (2017)。《成為越南學生：在台越南學生的遷移與認同》。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zpytdg
- 黃宗儀、黃佳媛 (2023)。「你怎麼嫁到比大陸還大陸的地方？」：性別化地緣政治與臺港跨境婚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4，51-9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0219528-N202405030002-00002
- 潘琄卉 (2021)。《新住民志工日常生活資訊行為探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tz2wpy
- 鄭詩穎、余漢儀 (2014)。〈順從有時，抵抗有時：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家庭照顧經驗中的拉鋸與選擇〉，《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9，149-197。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14.29.04
- 龔宜君 (2019)。〈格格不入：來臺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雙重缺場〉，《臺灣社會學刊》，65，69-125。
- Ullah, A.K.M.A. & Chatteraj, D. (2023). Inter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and its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61, 262-278. https://doi.org/10.1111/imig.13172
- Alinejad, D. (2019). Careful co-presence: The transnational mediation of emotional intimacy. *Social Media + Society*, 5(2), 1-11.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9854222
- Allmark, P., & Wahyudi, I. (2016). Female Indonesia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advocacy through Facebook and the story of Erwiana Sulistyarningsih. In C. Gomes (Ed.), *The Asia-Pacific in the age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and identity on and through social media* (pp. 19-40). Anthem Press.
- An, S., Lim, S. S., & Lee, H. (2020). Marriage migrants' use of social medi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2), 83-99.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20.1725073
- Atwood, J. D. (1996).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therapy assumptions. In J. D. Atwood, (Ed.), *Family scripts* (pp. 1-33).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Berne, E. (1975). *What*

- do you say after you say hello?* Corgi Books.
- Berntsen, D., & Rubin, D. C. (2002). Emotionally charg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cross the life span: The recall of happy, sad, traumatic and involuntary memories. *Psychology and Aging, 17*(4), 636-652. <https://doi.org/10.1037/0882-7974.17.4.636>
- Berntsen, D., & Rubin, D. C. (2004). Cultural life scripts structure recall from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Memory & Cognition, 32*(3), 427-442. <https://doi.org/10.3758/BF03195836>
- Berntsen, D., & Bohn, A. (2009). Cultural life scripts and individual life stories. In P. Boyer & J. V. Wertsch (Eds.), *Memory in mind and culture* (pp. 62-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6999.005>
- Bourdon, J. (2019). From correspondence to computers: A theory of mediated presence in hist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30*(1), 64-83. <https://doi.org/10.1093/ct/qtz020>
- Byng-Hall, J. (1995). *Rewriting family scripts: Improvisation and systems change*. Guilford Press.
- Cheng, I. (2021) Motherhood, empowerment and contestation: the act of citizenship of Vietnamese immigrant activists in the realm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Citizenship Studies, 25*(7), 975-992. <https://doi.org/10.1080/13621025.2021.1968688>
- Conway, M. A., & Williams, H. L. (2008).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J. H. Byrne (Ed.), *Learning and memory: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Vol, 2*, (1<sup>st</sup> edition, pp. 893-909). Elsevier.
- Diminescu, D. (2008) The connected migrant: an epistemological manifesto.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7*(4), 565-579. <https://doi.org/10.1177/0539018408096447>
- Diminescu, D. (2020). Researching the connected migrant. In K. Smets, K. Leurs, M. Georgiou, S. Witteborn & R. Gajjala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igration* (pp. 74-78). Sage.
- Felton, E. (2014). A/Effective connections: Mobility, technology and well-being,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13*, 9-15. <https://doi.org/10.1016/j.emospa.2014.09.001>
- Fivush, R. (2004). The silenced self: Constructing self from memories spoken and unspoken. In D. R. Beike, J. M. Lampinen & D. A. Behrend (Eds.), *The self and memory* (pp. 75-93). Psychology Press.
- Gribble, C., & Tran, L. T. (2016). Connecting and reconnecting with Vietnam: Migration, Vietnamese overseas communities and social media. In C. Gomes (Ed.), *The Asia-Pacific in the age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and identity on and through social media* (pp. 63-85). Anthem Press.
- Ha, V. S. (2008). The harmony of family and the silence of women: Sexual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among rural married women in Northern Viet Nam.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0*, S163-S176. <http://www.jstor.org/stable/20461079>
- Hiller, H. H., & Franz, T. M. (2004). New ties, old ties and lost ti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diaspora. *New Media & Society, 6*(6), 731-752. <https://doi.org/10.1177/146144804044327>

- Hoang, L. A. (2016). Moral dilemmas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Vietnamese women in Taiwan. *Gender & Society, 30*(6), 890-911.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216670602>
- Ignacio, E. N. (2000). Ain't I a Filipino (woman)?: An analysis of authorship/authori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Filipina" on the ne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4), 551-572. <https://doi.org/10.1111/j.1533-8525.2000.tb00073.x>
- Lan, P.-C. (2019). From reproductive assimilation to 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framing and regulating immigrant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Taiwan.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40*(3), 318-333. <https://doi.org/10.1080/07256868.2019.1598952>
- Le Duc, A. (2016).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community building for illegal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in Thailand. *Journal of Identity and Migration Studies, 10*(1), 4-21. <https://ssrn.com/abstract=3071601>
- Le-Phuong, L., Lams, L., & De Cock, R. (2022). Social media use and migrants' intersectional positioning: A case study of Vietnamese female migrant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0*(2), 192-203. <https://doi.org/10.17645/mac.v10i2.5034>
- Levitt, P. & Jaworsky, B. N. (2007).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129-15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33.040406.131816>
- Leurs, K. (2019). Transnational connectivity and the affective paradoxes of digital care labour: Exploring how young refugees technologically mediate co-pres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6), 641-649. <https://doi.org/10.1177/0267323119886166>
- Licoppe, C. (2004). 'Connected' presenc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epertoire for manag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a chan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2*(1), 135-156. <https://doi.org/10.1068/d323t>
- Licoppe, C. (2012). Les forms de la présence. *Revue française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En ligne], 1*. <https://doi.org/10.4000/rfsic.142>
- Madianou, M. (2016). Ambient co-presence: transnational family practices in polymedia environments. *Global Networks, 16*(2), 183-201. <https://doi.org/10.1111/glob.12105>
- Madianou, M., & Miller, D. (2012).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Routledge.
- Marwick, A. E., & boyd, d. (2011).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 Society, 13*(1), 114-133.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0365313>
- McAdams, D. P. (1997). *The stories we live by: Personal myth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lf*. Guilford.
- McAdams, D. P. (2003). Identity and the life story. In R. Fivush & C. A. Haden (Ed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87-207).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Miller, D., & Slater, D.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al approach*. Routledge.

- Mitra, A. (1999).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WW Text: Tracing discursive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5(1).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1999.tb00330.x>
- Mitra, A. (2001). Marginal voices in cyberspace. *New Media & Society*, 3(1), 29-48.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01003001003>
- Nguyen, L. K. (2016). *Women as fish: Physical move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 Nikunen, K. (2020). Breaking the silence: From representations of victims and threat towards spaces of voice. In K. Smets, K. Leurs, M. Georgiou, S. Witteborn & R. Gajjala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igration* (pp. 411-423). Sage. <https://doi.org/10.4135/9781526476982.n41>
- Ong, W. J. (1975). The writer's audience is always a fictio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90(1), 9-21. <https://doi.org/10.2307/461344>
- Palriwala, R. (1996). Negotiating patriliney: Intra-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authority in Rajasthan (India). In R. Palriwala & C. Risseuw (Eds.), *Shifting circles of support: Contextualising kinship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 (pp. 190-220). Sage.
- Palriwala, R. & Uberoi, P. (2008). Exploring the links: Gender issues in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R. Palriwala & P. Uberoi (Eds.), *Marriage, migration and gender* (pp. 23-62). Sage India Pvt. <https://doi.org/10.4135/9788132100324.n1>
- Sayad, A. (2004). *The suffering of the immigrant*. Polity.
- Schank, R. C. (1977). Scripts. In R. C. Schank & R. P. Abelson (Eds.),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 (pp. 36-68). Lawrence Erlbaum.
- Smith, S., & Watson, J. (2010). *Reading autobiography: 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ternadori, M. M. (2020). *Mediated eros: Sexual scripts within and across cultures*. Peter Lang.
- Swann, W. B., & Bosson, J. K. (2008) Identity negotiation: A theory of self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O. P. John, R. W. Robins & L. A. Pervi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 (pp. 448-471). Guilford Press.
- Tomkins, S. S. (1979). Script theory: Differential magnification of affects. In R. A. Dienstbier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78: Human emotion* (pp. 201-236).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Tomkins, S. S. (1987). Script theory. In J. Aronoff, A. I. Rabin, & R. A. Zucker (Eds.), *The emergence of personality* (pp. 147-216).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Tosi, M. T. (2010). The lived and narrated script: an ongoing narrative construction. In R. G. Erskine (Ed.), *Life scripts: A transactional analysis of unconscious relational patterns* (pp. 29-54). Karnac Books.
- Truong, T. T. H. (2008). Women's leadership in Vietna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4(1), 16-21. <https://doi.org/10.1086/588432>
- Ullah, A.K.M.A. & Chatteraj, D. (2023). Inter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and its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61, 262-278. <https://doi.org/10.1111/imig.13172>
- Vertovec, S. (2001). 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7(4), 573-582. <https://doi.org/10.1080/13691830120090386>
- Wang, Y. H. (2010). Being a mother in a foreign land: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wives on mothering experiences in Taiwan. 《台灣東南亞學刊》, 7(1), 3-40. <https://doi.org/10.7039/TJSAST.201004.0003>
- Zhou, M. (2004). Revisiting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Convergencies, controversies, and conceptual advanceme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3), 1040-1074. <https://doi.org/10.1111/j.1747-7379.2004.tb00228.x>

# Migrant Memories, Social Media,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 Vietnamese Female Migrants in Taiwan

Yow-Jiun Wang\*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experiences of bilingual Vietnamese female migrants in Taiwan, investigating how they construct migrant memories and negotiate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through Facebook narrative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narrative memory and life script, it examines the verbal, visual, and auditory texts on Facebook that represent these women's daily lives as self-narratives, looking into how they build up memories and identities and how they carve out life scripts accordingly in the online dialogic space. Concepts of presence and imagined audience are adopted for explicating the negotiated aspect of the female migrants'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It is argued that, when constructing and sharing memorie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on social media, the migrant women negotiate their dual identities as emigrants and immigrants as well as their mediated transnational presence. Eleven Vietnamese female migrants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All of them speak fluent Mandarin Chinese,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aiwa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of Facebook postings were conducted, focusing on how the participants actively created and shared micro-records of their daily life on Facebook - the most popular social networking site among Vietnamese

---

\* Yow-Jiun W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yowjiun@ncku.edu.tw.

migrants in Taiwan.

Emphasis is placed on how the female migrants represent their lives and develop dual dialogu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home and receiving countries. The addressees from both countries are viewed as the imagined audience and perceiving others to whom the migrant women represent themselves and with whom they negotiate their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How the imagined audience and perceiving others make assumptions about and impose expectations on the female migrants' lives often affect how these women create their online narrative scripts for memor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Building a well-acknowledge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suggests the fulfillment of double life scripts: one as an emigrant and the other as an immigrant. As emigrants, they are expected to be dutiful Vietnamese daughters who are pious, resilient, responsible, and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families. As immigrants, they are constantly subjected to prescribed family roles, including mothers, caretakers, and income earners. On top of that, they often suffer from stereotypes and discriminations, because of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ized marriages between Taiwanese men and Southeast Asian women.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ultimately are inclined to represent the bright side of their migrant lives, accentuating delightful moments in Taiwan and their attachments to the homeland, no matter which audience is addressed. The participants' narrative memories on Facebook that embody their ideal scripts of migrant life are marked by joyful motherhood, family or friend gatherings, work or life achievements, and trips around Taiwan or journeys to Vietnam. Stories carrying negative experiences are generally omitted, modified, or transformed into more agreeable versions in line with the idealized scripts. Carefully maintaining their transnational presence, the female migrants avoid adding emotional burdens to their original families who are usually unable to provide substantial supports. For the sake of self-esteem, they tend not to

disclose unfavorable aspects of their migrant lives in front of their Vietnamese addresses who may be skeptical of their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and living circumstances. While staying optimistic and confident is a common practice, the participants are cautious about showing off or bragging about their life in Taiwan out of concern for potential doubts of their loyalty to the home country. To build better immigrant images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y refrain from revealing discontent with or criticisms of the receiving society on Facebook. Nevertheless, in seeking self-worth and public recognition, they may move away from the tempered immigrant scripts and try to make their voice heard.

The pleasant memories and dignified identities represented as such reflect overall the Vietnamese migrant women's efforts to construct and fulfill their own migrant life scripts. The all-positive narrative scripts not only arise from their wishes to comfort their family and to seek recognition, but also from their determination to lead a happy, decent life. Self-narratives mirror both the life scripts embodied and those anticipated by the narrators. To survive adversities and find meanings in their transnational lives, the participants opt for self-affirming scripts in interpreting and shaping their daily experiences. Victimhood, suffering, or fragile scripts are thenceforth disfavored. Choosing positive narrative scripts over negative ones, they strive to lead their everyday lives in alignment with their ideal scripts. Social media as platforms for self-narration are actively employed to build connections and presence as well as idealized scripts for both personal memories and daily situations.

The fulfillment of ideal scripts for migrant memories on Facebook affirms the narrators'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helps sustain their sense of bliss and self-appreciation, in turn spurring them to write and perform their own scripts of lives that are considered worth having. In so doing, they wrestle with everyday situations that are possibly less palatable, leaving out or reinterpreting memories that do not fit into the idealized scripts. The positions

in which the narrating migrants ground themselves conclude the final versions of their scripts, instead of the perspectives from the imagined audience and perceiving other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bilingual Vietnamese female migrants' Facebook use, shedding light on the dual dialogues and double life scripts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a highly digitalized and globally wired world. Expounding the online 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memory construction of Vietnamese women in Taiwan, the study indicates how self-narration on social media works in surviving the hardships of migrant life,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more disadvantaged than other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capital and autonomy needed for constructing a self-define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for a narrative script that serves to empower the connected migrant.

**Keywords:** presence, social media, identity, migrant, narrative memory, script

